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



张 爽 ◆ 著

*Study on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



张 爽◆著



*Study on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 / 张爽著. --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3.6

ISBN 978 - 7 - 81129 - 622 - 8

I. ①现… II. ①张… III. ①知识分子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①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2413 号

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

XIANDAIHUA BEIJING XIA DE ZHONGGUO ZHISHI FENZI YANJIU

张 爽 著

责任编辑 张怀宇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81 千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622 - 8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建构的传统资源	25
第一节 中西文化传统之差异	25
第二节 道统塑造下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34
第三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	43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建构的思想根本	67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观及其理论遗产	6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81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及其影响	89
第三章 西方理性主义: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建构的参照系	103
第一节 西方知识分子的诸种社会身份	103
第二节 西方知识分子发展过程中的理性主义传统	133
第四章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	149
第一节 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状况	149
第二节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挑战	165
第五章 生成中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186
第一节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生成的必要性分析	187

第二节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生成的可能性分析	194
第三节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应然样态	204
结 语	216
参考文献	220
后 记	232

导 言

我是属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出生的那代人。我们这代人和后几代人比较幸运,没有经历过父辈所经历的种种波折。我们亲历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日渐崛起的中国,享受的是逐渐富裕的生活,感受的是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各种异质文化之间强烈的冲击。相对于上一辈人物质生活的穷困,我们衣食无忧;相对于上一辈人文化生活的单调,我们能感受到异国情调;相对于上一辈人非“左”即“右”的价值选择,我们的价值选择是多元化的。相对于上一辈人,我们的确拥有了许多父辈们未曾拥有、享受和奢望过的物质与文化,但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正渐渐地成为精神流浪者。我们的视野有时会被丰富的物质产品紧紧地束缚,我们的追求有时会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我们的价值取向有时会有无目标地跟随着流行趋势,我们的自我有时候会在对偶像的疯狂和执着中迷失,我们的生活有时会变得如同平面几何图形一样毫无深度,我们有时甚至会放弃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我们自己似乎身处一个“不思不想的时代”。

徐复观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商业的发展使人的感官需求得到了圆满无缺的满足,眼、耳、鼻、舌、身获得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享受。但是,人们获得的这些满足和享受却是以人的思想的销蚀为代价的。如今,现代人只是生活在自己表层的“感官机能”的活动中。“这种感官机能,并不会通向自己的内心;更不会把感官的活动,在内心上

稍加凝注,因而把它由向内的沉潜而加以提炼、净化。同时,仅靠感官机能所了解的客观事物,也是各个孤立的;活动的本身,只是从‘这里’被动地移到‘那里’,没有法则上与意义上的关连。”^①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现代人把思想从自己的生活中驱逐出去,寻求自身之外的责任承担者,主体性逐渐丧失了,淹没在技术、商业与流行潮之中。个人思想无用武之地,现代人当然只能过着不思不想的生活。然而在人类生活中,事实上还存在着、永远存在着只能由心灵去接触而不能完全诉之于感官的东西,亦如徐复观所言,“这种不能完全诉之于耳目感官去感受的东西,并非等于不真实,更非等于不需要。站在人的生活立场来讲,或许这些东西即是最后的真实,最后的需要”^②。面对一个不思不想的时代,我们该怎么办?正是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我最初的写作计划是就中国人的精神状况进行研究。在进一步思考时我发现,研究中国人的整体的精神状况存在很大困难,因为“中国人”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括,它包括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社会层次中形形色色的人,对他们的精神状况进行研究非我个人能力所及。所以,在做最后决定时,我选择了“中国人”中的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作为研究对象。即使我把研究对象缩小到一个阶层或一个群体,这也是一个相当棘手的课题。

知识分子群体/阶层是文化资本的所有者。作为“资本”的所有者,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发展和强大的重要的中坚力量,预示着国家的发展潜力;作为文化的所有者,知识分子在思考和追求形而上理念——正义、公正、自由、平等、民主、真、善、美的过程中赋予世界以价值和意义。这就是说,知识分子既可以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做出

① 徐复观:《徐复观文集》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② 徐复观:《徐复观文集》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专业贡献,成为社会现实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还能够走出自己专业的限制,拥有广阔的社会视角,秉持形而上理念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来。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了“资本”作用,推动中国逐渐走向强大,因而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认可、重视和尊重。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却被阻抑或遗忘。从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来看,知识分子活动于民众的私人生活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之间的公共领域中,其社会作用是面向民众说话、对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实施舆论监督、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当知识分子发挥上述社会作用时,知识分子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而是知识分子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被视作是民众与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纽带;另一方面,公共知识分子实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即思考和追求形而上理念。所以,对中国来讲,知识分子是不可忽视的群体/阶层,而公共知识分子则更是我们所急需的。因此,我把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研究对象,希冀通过对这个群体/阶层的历史发展、精神世界的变化、追求的价值理念及其与中西文化传统的关系的研究,解决我的困惑:怎样走出不思不想的时代。

一、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

“知识分子”一词是在19世纪出现的。在词源上,学者普遍认为“知识分子”有两个词源:一个来源是法语的“intellectuel”,哲学家雷南在1845—1846年的一部手稿中最早使用该词。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勒努维耶和巴尔贝·都尔维利最早使用该词。最早把该词与“对政府不满”和“反对社会”联系起来的人是巴雷斯。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使“intellectuel”一词逐渐流行起来。由于“德雷福斯事件”,

“intellectual”开始指那些以追求正义、公平、真理为己任,以批判精神为特点的一个没有固定外延的群体。另一个来源是俄语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知识分子阶层),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曾经在1846年使用过,19世纪60年代由小说家波波雷金使用后被广泛接受。“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是指有修养的人、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成员和那些对沙皇俄国政府持批判态度的学者群体。不过,人们对“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理解通常是指对现状不满而批判政府的精英分子,如十二月党人、民粹派等。“知识分子”的这两个词源产生的时间大体相同,而且二者都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质,即追求普遍价值和永恒真理、对社会负有责任感、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政治和权力。除此以外,在英语中,“知识分子”一词有两种写法:“intelligentsia”和“intellectual”。其中,“intellectual”含义宽泛,指具有一定智力水平的、理解力强的人;“intelligentsia”则由“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转化而来,主要指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苏俄、东欧及独立前后的非洲不满现状的文化精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词源。^①统观“知识分子”的法、俄、英三个词源,“知识分子”大体上是指这样一类人,他们掌握一定的知识,具有较高的智识,他们有能力并且有意愿对国家政府和社会中不符合其价值标准的问题和现象进行分析批判。

自“知识分子”一词得到广泛的关注和使用以来,许多学者都用该词来指涉自己所指向的那个群体。在使用过程中,“知识分子”概念呈现多样化,每个学者都对自己所理解的知识分子进行界定。时至今日,学者之间依然未形成关于“知识分子”的公认的界定。

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国内外学者的标准不尽相同,各有侧重。

^① 参见王增进:《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国外学者的界定如下：

席尔斯把知识分子界定为在社会中那些频繁地运用半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

曼海姆认为，只有那些受过教育并在教育过程中人生内在素质获得“质的飞跃”的人，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

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区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是指没有依附关系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与社会有了某种固定的精神或物质利益上的有机联系，乐于充当某个阶级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的知识分子。

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分子是一批掌握了文化象征资本的人，是“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

刘易斯·科塞的知识分子是永远不对事物表示满意的人，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思想而生活的人。

李普赛认为知识分子是那些不满于现状，不断在人的象征世界中创造、传播和运用文化的人。

哈耶克把知识分子归结为在决定大众观点与社会舆论方面起着主导的、决定作用，远胜于专家和创造家的思想家。但是他在贬义上把知识分子理解为思想观念的二道贩子。

霍夫斯塔德认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更高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想有一种庄严的敬意，他的目的不复限于用专业知识来谋生；二是要在他所选择的专业范围内严肃地追求真理，这样他能够代表“社会的良心”，永远保持一种活泼开放的求新兴趣。

康菲诺综合各家的意见，把这一阶层的特征归结为以下的五点：（1）对于公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都抱有深切的关怀。（2）这个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因此认为

国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3)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4)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上,这个阶层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解答。(5)他们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

萨义德心中的知识分子是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把知识分子看作是社会的解毒剂,是人们面临抉择时的指路明灯。

拉塞尔·雅各比心中的知识分子是具有波希米亚气质的自由者。

.....

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并不是从一种严格的概念界定角度出发的。他们或者从事实层面把知识分子描述为运用特定符号或文字的人,或者从价值层面把知识分子规范为一定价值理念的体现者或维护者,或者从伦理层面把知识分子视为道德承担者或缺乏者。无论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进行何种形式的界定,无论他们持一种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他们都认可知识分子因为掌握知识而获得的某种特权,他们的行为可以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在中国,“知识分子”一词究竟是自主词还是外来词目前尚无定论。不过,有学者考证,1920年,一位署名为“无懈”的作者最早使用了“知识分子”一词。1925年后,人们开始逐渐使用该词。对“知识分子”一词含义的界定,中国存在两套理解体系。一套体系是以知识掌握和运用的程度为划分标准,知识分子就是掌握知识多的人、脑力劳动者。这种含义在中国被看作是不言自明的。学术权威机构也从这一角度来界定知识分子。2002年《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增补本中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第11

卷中的知识分子定义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掌握较多科学技术知识，以创造、积累、传播文化科技知识为专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中国学者有相当一部分也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知识分子，如韩亚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界定，认为狭义的知识分子特指受过一定的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并从事或主要从事精神生产（主要是学术研究、教育活动和文化传播）的人，而广义的知识分子泛指所有受过一定的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并从事或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他们分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杨凤城也区分了广义知识分子和狭义知识分子，指出广义的知识分子包括所有具备比较专门的系统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而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指传播和创造人类精神文化的人。郑也夫从理论和操作两方面定义知识分子。理论定义：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其社会生活中，在其工作、交往和表达时，比其社会中多数成员更频繁地使用符号象征体系和“一般性”的概念范畴，即运用一种特殊的“语言”；操作定义：知识分子是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大专）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人。实际上，当中国人提到知识分子时，大多数情况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来使用的。也许这个含义对中国人的影响甚深，所以，对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含义的理解始终受到质疑。

中国语境中对知识分子理解的另一套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知识分子理论的影响，从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角度来理解，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是具有知识和能力并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人，他们是“社会的良心”。这种知识分子常常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相对而言，这种界定所包括的知识分子范围较为狭窄，因为有知识的人可能是知识分子，但却不一定是公共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理解在一部分学者中得到认可。

张汝伦认为，知识分子是知识和价值的创造者与维护者，正统与教条的批判者和希望的坚持者。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的知识分子才

是知识分子,亦即公共知识分子。

许纪霖认为,从词源学上理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部门的管理者以及职业性学者很不相同。

王岳川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关注公共领域价值尺度建构的“边缘性知识分子”。

尤西林认为,知识分子是世界意义的阐释者和守护者。

萧功秦认为,知识分子是“观念人”,他们受过高深的人文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同时又比一般人拥有更多的文化知识与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他们具有为理念而献身的行动倾向。

王增进的“三I定义”: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智力(intelligence)水平较高、对自然或社会问题怀有一贯而浓厚的探索兴趣(interest)并有所创新(innovation)的人。

刘晔认为,知识分子是以知识去关注、参与和影响公共事务的群体,其本质特征在于“知识性”和“公共性”。一方面,知识分子必须具有为知识而知识的能力和追求真理的品质;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基于公共精神之上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

在目前中国的学术界,学者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逐渐侧重于第二种含义,这与学者们对中国知识分子现状的判断有一定的关系。学者们认为,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知识分子呈现出学院化、专业化、专门化、明星化等倾向,他们或者囿于学术研究而脱离社会公共事务,或者频频出现于大众传媒而成为学术明

星,或者卖弄学术成果以期获得经济回报从而沦为学术贩子。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出现了危机,即知识分子丧失了公共视域和社会关怀,放弃了思考和批判,混迹于市。出于改变知识分子现状的急切心理,中国一些学者借鉴西方知识分子理论,认为中国应当根据自己的历史背景与当代社会条件呼唤和培育新的知识分子形象,即活动于公共领域中的公共知识分子。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其界定方式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界定。横向界定强调知识分子与其他群体的区别——接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知识,以精神活动为主要活动方式;纵向的界定强调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以使其与自己的历史原型相区别。二是从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界定,这是较普遍的界定方式。事实层面的界定关注的是“知识分子是什么”,如脑力劳动者、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者、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受教育者等;而价值层面的界定更关注“知识分子应是什么”。这就是说,仅具备了事实条件还不能构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还应该是公正、公平、正义的化身,是人类良心的代表,是具有理性批判精神的斗士……很多西方学者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认可知识分子身份的。中国学者的视线目前正在逐渐从事实层面的知识分子转向价值层面的知识分子身上。

关于本书中知识分子概念的使用说明:第一,本书虽然是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是由于研究需要,本书还谈到了西方知识分子。在本书中,我并没有对中国语境中的“知识分子”概念与西方语境中的“知识分子”概念做区别,因为该区别并不影响本书的论述。第二,在行文中,我在一个普遍的、为大众所普遍理解的含义上使用“知识分子”一词,而没有对其做出概念界定。对本书而言,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自明的概念,而真正需要说明和界定的是本书的结论性概念——公共知识分子。第三,我在书中把“公共知识分子”

概念界定为“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在以学术为志业的基础上,面向(to)公众发言,为(for)公众而思考,谈论(about)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并对现实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知识分子”。任何符合该描述的知识分子都可以是公共知识分子。本书先后使用了“知识分子”概念和“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目的是试图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这个事实群体的论述,实现其向价值群体的过渡。

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比较早,这方面的论著也非常多。国外学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也存在着否定观点。持否定观点的主要是英国的两位学者哈耶克和约翰逊。哈耶克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严格地把自己限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内,不要对其他问题指手画脚。那些试图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发表意见的人,只能是知识的“二道贩子”。在《知识分子》一书中,保罗·约翰逊否定了知识分子与道德的必然联系,并警告读者要警惕知识分子的思想专制。总体来看,西方的学者对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得比较透彻,涉及的知识分子问题也比较广泛。在中国,随着社会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分子”日益进入学者的视野,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研究、文章、专著逐渐丰富起来。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在我所搜集到的论著中,国外学者对知识分子的研究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对知识分子含义的理解。国外学者对知识分子含义的界定和理解并没有一致的观点,不过,从上面所列出的一些学者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把知识分子理解为“社会的良心”、

公共领域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并在其身上寄托了一定的价值诉求。国外学者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理解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影响较大。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除了指称有学问、有知识的人,脑力劳动者以外,还指称那些参与公共事务、发表公共言论的具有批判精神的人。知识分子的这层含义在中国得到了学者的认可。

2. 公共知识分子。自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之后,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国外学者争论的对象。在知识分子是否能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存在的问题上,一些学者期待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扼腕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消逝。雅各比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公共文化的贫困、公共生活的贫乏。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公共文化衰落导致公共知识分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高科技知识分子、顾问和教授。所以,雅各比把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知识分子称为“最后的知识分子”。雅各比的观点在其他学者中产生了共鸣。朱利安·班达把知识分子沉迷于集体、国家或民族主义政治的状况视作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失。博格斯特针对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对人们的批判性话语权利的剥夺指出,批判性话语的明确表达要求公共领域的扩大,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将成为意识形态的反抗力量。弗兰克·富里迪也认为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都销声匿迹了,现存的知识分子或者向工具主义妥协,或者肯定现实,认可制度化,或者媚俗,愚弄民众。理查德·A.波斯纳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依托其智识资源,面对受过教育的广大社会公众,就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维度的问题发表高见的人。不过在当代美国社会,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了。还有一些学者否定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形象,这主要以哈耶克为代表。哈耶克认为知识分子在道德上是有病垢的,他们仅仅是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并提出知识分子永远不要在自己专业能力之外发表公共意见。关于公共知识分子活动的范围,哈

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把公共领域视作处于国家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权利领域之间的一个具有政治批判性的空间。公共知识分子即在这个空间中发挥作用。

3. 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这个问题是指知识分子在现代性、后现代性背景下的发展趋势。在这个问题上,国外学者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肯定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批判能力和批判权利,肯定大写的知识分子,反对把知识分子局限为某个专业的学者或专家。随着现代性发展的深入,知识分子受到技术理性主义的影响而变得专业化、专门化,缺乏公共关怀,他们成为博格斯所说的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成为萨义德所鄙视的专业知识分子,成为布尔迪厄理论中的媒介知识分子,成为德布雷笔下的社会名流……知识分子在当代的这些身份都遭到了否定和批判。这说明在国外学者的信念中,知识分子还是价值意义的创造者、承载者和实现者。另一种观点则强烈地反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权利,否定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遍性身份,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最恰当的身份是专家学者。福科从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构出发,消解了现代性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普遍性代言人的身份,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只是某个部门、某个领域中的具体知识分子。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状态下,权威消失了,能够赋予主体思想以合法性的话语越来越少,后现代的知识呈现异质性,并不再具有元叙事功能。由于具有元叙事特征的知识的合法性被颠覆,知识分子只能蜕去他的普遍性形象而成为专业人才。后现代学者和现代学者对现代性的不同态度导致了他们对知识分子理解的截然对立。总体上看,现代社会寻求普遍性知识分子的呼声要多于对具体知识分子的赞美,但是后现代学者对知识分子因知识而形成霸权的警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4. 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西方学